

翠谷的傳播教育：「世新模式」探索^{*}

游梓翔^{**}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教授

溫偉群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教授

摘要

1956年由知名報人與教育家成舍我（1898-1991）創立於臺北的世新大學，咸認為臺灣傳播教育的領導品牌之一，以貼近實務脈動與綿密校友網絡為其最大優勢。作為對傳播教育工作者極具參考價值的傳播教育實踐案例，本文旨在梳理（一）世新大學自1930年代始於北平世新，近一世紀一脈相承的辦學歷史；（二）受成舍我及其辦報理念影響的重要價值精神，如世界主義、德智兼修、手腦並用與我要說話；以及（三）世新大學回應西方傳播教育面臨的「理論／實務」、「口語／媒體」及「歸人／過客」等三大斷裂之「全媒體」、「全傳播」及「全貫穿」等策略，目的在總結臺灣傳播教育中「世新模式」之內涵。

關鍵詞：世新大學、成舍我、理論實務並重、臺灣傳播教育

* 作者感謝本文撰寫過程中成露茜民國新聞史研究團隊資料提供與協助。

**Email: tyu@mail.shu.edu.tw

投稿日期：2021年3月2日

接受日期：2021年5月21日

壹、緣起

位於臺北市南端的世新大學（簡稱世新），風景別緻，從正門進入校園必經一條隧道，隧道另一端是綠樹蒼蒼的青翠山谷。這讓世新得了「翠谷」的別稱。

數十年來，於這片幽靜翠谷之中，世新發展成為臺灣傳播教育的領導品牌之一。《Cheers 雜誌》對世新的介紹是「新聞傳播教育起家」，也是臺灣「傳播科系最多」、「唯一設有傳播博士班的私立大學」；另外，世新「孕育大量的媒體實務人才，尤其以廣電媒體為多」，且「綿密的校友網絡與貼近實務脈動，始終是世新的一大優勢」（潘乃欣，2018年8月29日，頁68），這基本反映了世新在臺灣的普遍評價。

世新是由知名報人成舍我（1898–1991）於1956年在臺北所創。初建時是職校層級的「世界新聞職業學校」，歷經「世界新聞專科學校」（1960）和「世界新聞傳播學院」（1991）等發展階段，於1997年升格成現在的綜合型大學。不變的是世新始終以傳播教育為其特色，並一直使用「世新」的簡稱。

與臺灣乃至兩岸三地其他教育機構相比，世新的辦學模式深具特色、自成一格。本文旨在探討世新如何以其特殊的辦學歷史、理念和策略，形成一套傳播教育的「世新模式」（*Shih Hsin Model*），特別是在回應西方傳播教育發展歷程中面對的重大挑戰方面，「世新模式」作為傳播教育的一個最佳實踐案例，具有供華人傳播教育工作者參考的重要價值。

本文作者將從歸納西方推動傳播教育遭遇的三大「斷裂」——「理論／實務斷裂」、「口語／媒體斷裂」和「歸人／過客斷裂」為論述起點，繼而以世新為案例，理解世新在中國大陸的十多年和在臺灣的六十五年發展，是如何以其特殊的傳播教育模式，應對各項挑戰，為臺灣培養傳播人才。

貳、傳播教育面對的三大斷裂

論及現代大學層級傳播教育的建立，最具規模的當然是美國。而臺灣的傳播教育，受到留美學者的影響很大。美國大學的傳播專業課程，是在19世紀下半葉起逐步發展，主要有兩個發展源頭：一是為因應報業蓬勃發展，產生的「新聞」（journalism）或「報學」訓練需要；另一則是因工商業盛行，培養學生表達能力的「口語」（speech）或「言語學」訓練需要。20世紀初，新聞與口語均邁向學科化，於是「新聞／大眾傳播」（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以及「口語

／人類傳播」(speech/human communication)和這兩個關係密切且頗具規模的學科，在 20 世紀中期基本成型。20 世紀後半葉，兩者又逐漸融合成更大的「傳播學門」(field of communication)。

任何學門在演進成長的歷程中，都會遭遇學門核心界定以及學門領域整合的挑戰，傳播學門也不例外。參酌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在西方傳播教育推展的過程中，曾經發生的三個理念與路線辯論，可以稱之為三大「斷裂」(divides)。

第一也是討論最多的斷裂是「理論／實務斷裂」(theory-practice divide)，就傳播學門而言，即傳播教育應該以理論或是實務為重的討論。傳播教育起於實務訓練需要，但因為置身大學校園，其分配資源的正當性又需要為其他學術學門認可接受，這就讓傳播教育一直面對理論和實務斷裂的挑戰。這就是夏春祥(2002, 頁 11)所謂的「如果學術理論與技術實務是一條線的兩段，那麼目前的傳播研究困境，可以說是最矛盾的體現」。

以新聞／大眾傳播為例，在學科創建之初，就有「威斯康辛模式」(Wisconsin Model)與「密蘇里模式」(Missouri Model)¹之間的爭辯(Altschull, 1995)。兩位代表人物之一是在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推動新聞教育，後來成為新聞學院(成立於 1927 年)院長的 Willard Bleyer (1873-1935)，另一位則是在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主持全美首個新聞學院(成立於 1908 年)的 Walter Williams (1864-1935)。Bleyer 重視研究，希望透過學術發展提升新聞學地位；Williams 則認為新聞學始終應以專業訓練為核心(Rogers & Chaffee, 1994)。「威斯康辛模式」與「密蘇里模式」之爭一直延續到新聞傳播學高度學科化之後，在新聞學院的屋頂下，重實務輕理論的「綠色遮光罩人」(green-eyeshades)，似乎始終與重理論研究但輕視實務的「卡方人」(chi-squares)存在格格不入之感(游梓翔、夏春祥，2003；Dickson, 2000; Lovell, 1987; Rogers, 1997)。

在中國發展新聞教育之初，也面對著理論與實務孰輕孰重的問題，其中不能忽略的是 Walter Williams 於 1921 年曾到中國演講，受到各界重視，²這使得密蘇里模式更早影響了中國的新聞教育，張詠、李金銓(2019, 頁 343)指出「長

1 美國傳播教育界另一個稱呼「密蘇里模式」的常見名詞是「密蘇里方法」(Missouri Method)，重視實務訓練的密蘇里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動手做」(hands-on)和「做中學」(learn-by-doing)(The J-School, n.d.)。

2 Williams 於 1921 年 12 月訪問中國，4 日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講題是「世界的新聞學」(Williams 著／林斯陶譯，1921；方漢奇，2000，頁 938；任白濤，1941)，負責口譯的是胡適；此行 Williams 還在清華大學演講「受過教育者的特點」(〈校聞：名人演講〉，1921)。

期以來，國人說到美國的新聞教育似乎只知道密蘇里，密蘇里新聞學院在中國甚至比在美國有名」。不過即使多所學校都仿效了密蘇里新聞學院，但理論與實務課程孰先孰後、適當比重為何，始終是中國新聞教育者的爭論焦點。例如王師萊（1947）就認為新聞教育應兼顧「技術教育」和「認識教育」，並以前者為首重，因為「新聞教育並非訓練一個僅僅懂得理論，而是必須實踐地應用理論的新聞工作者」，不過探討比重，他卻認為技術課程應占總課程的三分之一。就時數上看，這似乎又把「認識教育」看得更重要。儲玉坤（1948，頁 19）則認為好的新聞教育應該「和研究兵學一樣，三分理論七分實際」。

傳播教育可能面對的第二項斷裂，來自「口語／人類傳播」和「新聞／大眾傳播」的區分。傳播學者描述這種區分的名稱不一，有人就直接以「人際／大眾傳播二分」來稱呼（Reardon & Rogers, 1988）。因為這基本是出身口語傳統的學者和出身新聞傳播學者間的鴻溝，本文作者稱之為「口語／媒體斷裂」（speech-media divide）。此項斷裂會出現，正是因為傳播教育最初來自兩個源頭，口語一支更關注人的親身溝通，媒體一支則更關心人類透過媒介的傳播。雖然一世紀以來，無論在專業傳播學會（如美國全國傳播學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與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或大學校園，都有不少西方傳播學者致力整合兩者，但迄今仍未能化解口語與媒體兩個傳播教育傳統間的分歧（游梓翔、夏春祥，2003）。

雖然有學者分析早在 1927 年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中就有「交通／傳播」兩種譯名的區分，前者更接近口語或人際傳播，後者則更接近媒體傳播（高海波，2013）。但在華人傳播教育體系，「新聞／大眾傳播」一支的獨大頗為明顯。例如大陸學者劉海龍（2019，頁 107）指出，「中國語境中所說的『傳播學』其實並不是一個準確的概念，或者說更接近於一個由中國學界自己創造的本土概念，即『新聞學』」，但傳播學的範圍其實要比新聞學或大眾傳播學大得多，涵蓋人際與群體傳播在內。劉海龍（2015，頁 132）也曾提到在傳播學 1980 年代引入大陸的過程中，「大眾傳播理論與傳播理論被畫上了等號」的問題。這說明了在大傳播學門下整合口語和媒體教育的目標，在華人世界似乎比西方挑戰更大。

談論到傳播學門的整合問題，美國傳播學者 Pooley (2016) 為文指出，美國傳播學存在著四大若即若離的文化，包括：一、口語與修辭，二、重實務的大眾傳播學、三、疏離實務的大眾傳播學，以及四、電影研究在內。他認為四者的疏離（即使辦公場所座落於同一棟大樓內），將無法適應今日社會對匯流融合和學

科跨界的要求，更不利傳播學的內部整合與對外形象。從本文採取的框架來看，Pooley 指出的四大文化疏離現象，同時反映除了傳播教育的「理論／實務斷裂」以及「口語／媒體斷裂」，其結果就是破碎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

論及傳播教育的第三項斷裂，本文作者借用了臺灣詩人鄭愁予《錯誤》中的兩個中文用語，稱之為「歸人／過客斷裂」（tarrying-passing divide）。但其英文來自在 1960 年代傳播學門逐漸成形時，學門主要推動者 Wilbur Schramm 的一段文字：

傳播理論與研究可說吸引了心理學者、社會學者、人類學者、政治學者、經濟學者、數學家、歷史學者和語言學者的興趣，而來自這些和其他領域的學者們也對我們理解傳播做出貢獻。這是一個學術十字路口，很多人路過，但只有少數人逗留。(Schramm, 1963, p. 2)

Schramm 是傳播學學科化的重要推手，而這個傳播學是「傳統的英語系中的修辭演講方向，加上新聞研究，再加上形成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社會學、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社會科學，雜糅而成」（劉海龍，2019，頁 107）。但 Schramm (1963, p. 2) 的感慨，是初創的傳播學門成為了協助各科學者瞭解所屬學科中傳播問題的一種「附隨研究」（auxiliary study），因此過客居多，真正以傳播學位學術認同核心的歸人較少。這透露出傳播學學術正當性與地位不足的些許無奈。從 Schramm 的時代以來，從事傳播教育的人，經常必須面對傳播是作為其他專業的一個「副科」，還是足以成為「主科」的挑戰。這項挑戰即使在十字路口比喻發表的六十多年後，仍是傳播教育工作者所必須面對的。

在中國，也存在著一個十字路口。在中國推動新聞教育的人之所以來到這個路口，不是為了要長期建立新聞傳播作為一個學門的基礎和地位，而是為了人力的短期所需。這就是卜少夫（1944，頁 65-66）說的「過去創立新聞教育機關的人，主要的動機由於應一時緊急的需要，以致用為主，很少是為了企圖建立中國新聞學術，以求中國新聞學在學理技術上的奠立」。

本文論述傳播教育的三大斷裂出發，是因為作者相信，「世新模式」作為傳播教育的一套理念和作法，很多方面都能對這三大斷裂有所因應。接著作者將從歷史沿革、價值精神和因應策略三方面，梳理「世新模式」的形貌。

參、探索世新發展的歷史軌跡

世新在臺灣的發展開始於 1956 年創立的「世界新聞職業學校」，但這其實並非世新的真正源頭。世新的最前身可以溯至成舍我於 1933 年在北京創辦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北平新聞專科學校一般簡稱「北平新專」，但因其與《世界日報》的關聯，也被稱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我們可以稱之為「北平世新」。

北平世新的創辦，是在成舍我所辦，以「世界」為名的三家報紙——《世界晚報》（1924）、《世界日報》（1925）、《世界畫報》（1925）之後。如果從「三個世界」的時代算起，世新的辦學文化更已有逼近一世紀的孕育與積累。

世新創辦人成舍我是在 1917 年從滬到京。透過舊識——時任北京大學文科長的陳獨秀（1879–1942）協助，進入北大就讀。又因先前已有報館校對編輯經驗，再經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1889–1927）介紹，到北京《益世報》工作。他很快在《益世報》展露頭角，從小編輯成了大編輯（吳範寰，1963）。

後來成舍我決定自己辦報。草創時只用了兩百大洋，「堪稱奇蹟」地辦了《世界晚報》（黃侯興，1998，頁 73），再陸續辦了日報和畫報。1927 年，成舍我又在南京創辦《民生報》，1935 年則在上海創辦《立報》。作為開辦含世界三報等多家報紙的成功報人，管翼賢（1943，頁 167）評價成舍我為「北京新聞界之巨擘」，將其名列六位中國「報業名人」，與徐寶璜、戈公振、林白水、邵振青和張季鸞並列。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 MacKinnon 教授，在關於民國新聞史的論文中如此評價成舍我：

……或許最有趣最具雄心的新報業大亨——也是中國以外較少人認識的——就是成舍我，他在北京、南京、漢口和香港創辦了系列報紙，同時也辦了最早的新聞職業學校之一。（MacKinnon, 1997, p. 9）

除了北平世新，³MacKinnon 也提及成舍我後來還創辦了臺灣世新，並說這是在臺灣「最為人們記得的成就」（MacKinnon, 1997, p. 10）。加拿大卡爾頓大學（Carleton University）的 Eaman (2009, p. xxxv) 教授，也將北平世新的創辦事蹟，寫入了他主編的《新聞學歷史辭典》「大事紀」中。這都說明了北平世新和

3 MacKinnon 教授在論文中誤植新聞專校的創辦地點為上海。

後來世新的發展受到國際傳播學界的一定注意。

據後來擔任臺灣世新校長及董事長的成舍我之女成嘉玲（1998，頁 165）回憶，成舍我之所以創辦北平世新，是因為「當時的新聞記者素質欠佳，不夠專業，新聞道德素養又缺乏」，因此透過辦學可以「培養一幫夠水準的記者，好提高報紙的水平」。MacKinnon (1997, p. 10) 也認為成舍我比起同期其他報人，在辦報初期時便更關注「如何提高新聞作為一項專業的地位和標準」。

其實成舍我辦理新聞教育的準備和想法由來已久。他在 1926 年便曾透過《世界日報》籌組「報童工讀學校」，既協助北平貧童也能解決報館派報的人力問題，收「讀可兼工，一舉兩善」之效（〈報童工讀學校募捐啟〉，1926 年 10 月 4 日），後來《世界日報》和《立報》又招考「練習生」，作為人才來源（唐志宏、連慧珠，2011）。1929 年，成舍我應邀擔任國立北平大學（簡稱平大）秘書長，也有建立大學本科等級新聞教育的嘗試。他本計畫在平大法學院設置「新聞專修科」並自兼主任，可惜幾經輾轉該計畫未能落實（賀逸文等人，1982）。結束平大工作後成舍我赴歐美考察新聞事業於教育機構，在美期間參訪了美國大學新聞教育極具代表性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當成舍我訪問之時，Williams 已成為了密蘇里大學的校長，兩人曾談及「新聞商業化」的問題（成舍我，2012a，頁 33）。

自歐美考察返國後，成舍我決心私人辦學，創立北平世新，於 1933 年 2 月正式招生。因為未來工作能有確保且不收學費，在當時引發的迴響極其熱烈，1933 年 3 月 4 日天津的《北洋畫報》報導了北平新專的招生盛況：

北平最近最有號召能力之學校，厥為世界日報社長成舍我創辦之新聞專科學校。該校現招職業班新生，原定只取四十名，結果報名者達六百人，⁴ 蓋以該校既不收學費，且可擔保異日有事可作也。（記成舍我之新聞專科學校，1933 年 3 月 4 日）

北平世新最早設置「初級職業班」和「報業管理夜班」。1933 年 4 月 8 日首屆開學。初級職業班的 40 位新生中包括本名林含英，後來成為知名作家的林海音在內（林海音，1998）。1935 年 9 月，北平世新又再開辦了「高級職業班」（賀逸文等人，1982）。整體規劃上，原本在初級和高級班後，就要開設本科，成為「2 + 2 + 3」的三階段設計（成舍我，1935，頁 105），希望「修業滿七年者，

4 後來成舍我先生在北平新專開學講話中說報名人數是四百多人（成舍我，1935）。

對新聞事業全部之必須技能與知識，皆可有一相當之明瞭，無論其為報社之經理或編輯，甚至，印刷工人，均能應付裕如」（管翼賢，1943，頁 212-213），可惜後來本科的招生計畫因盧溝橋事件發生而未能實現（許曉明，2016）。

北平世新的創辦可以放置在歷史的大脈絡中看。1930 年代的中國新聞教育尚處新生階段。雖然 1912 年「全國報業促進會」就有創設「報業學堂」以培養專門人才發展報業的提案，卻因該會崩解無疾而終。1920 年「全國報業聯合會」籌設「新聞大學」之議也未能落實。中國大學新聞教學的開端，從北京大學 1919 年的「新聞研究會」開始，但要到 1921 年上海的聖約翰大學的報學系，才算是中國第一個大學新聞系。到了十二年後的 1933 年時，已有不少大學或專科設置新聞系，⁵但也有部分短期便告夭折。⁶北平世新創立時，雖僅為專科，因有《世界日報》在內的多個重要報刊為支援，頗被新聞教育界看重。例如 1935 年 1 卷 2 期的《報學季刊》在「新聞教育機關概況」的欄目中，便納入了北平世新，與同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新聞系（1924）、廣州的中國新聞學專門學校（1928）、上海的復旦大學新聞系（1929）及滬江大學商學院的新聞科（1929）並列。⁷

其中北平世新和滬江大學商學科又與一般大學的新聞系不同，算是由報社或通訊社直接參與主辦。⁸卜少夫（1944，頁 66）指出，當年因中國報紙劇增，各校培養之人才數量太有限，報館依靠練習生學徒補充人才緩不濟急，自辦學校則得以「訓練實現自己從事新聞事業的主張和方法的大批幹部」，比其他大學的畢業生更好用。卜少夫等於解釋了世新這套辦學模式的優勢。大陸學者陳建雲（2010，頁 239）則評論說，「在舊中國民營報人中，能夠做到辦報、辦學相輔相成、齊頭並進，成舍我一人而已」。時任上海《新聞報》總編輯的郭步陶到上海民治新聞學專科學校演講「中國的新聞教育」，提起了北平世新，他說：

5 1933 年以前設置或曾設置新聞科系的主要大學除聖約翰大學，還有廈門大學（1922）、北平的平民大學（1922）、上海的大夏大學（1923）、北平的燕京大學（1924）、北京的法政大學（1924）、國際大學（1924）、上海的南方大學（1925）、上海的光華大學（1926）、民國大學（1926）、復旦大學（1929）、滬江大學商學院（1931）。專科則有中國新聞學院（1928）、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28）。

6 1933 年以前即停辦新聞系的學校如廈門大學（1926）、南方大學（1925），而燕京大學則一度在 1927 年停辦，1929 年復系。

7 另外《報學季刊》在 1 卷 3 期中還納入了北平的民國大學新聞專修科，以及兩所函授學校，分別是上海的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和濟南的濟南新聞函授學社。

8 滬江大學商學院新聞科除了與上海《時事新報》合辦，參與者還有上海多家報紙和通訊社的主管，如《新聞報》、《晨報》、《申報》、《大陸報》、申時電訊社等（申時電訊社，1935b）。

我倒很贊成他這種辦法，因為一面讀書，一面到他自己報館裡去練習，所以得的經驗就比只在課堂上讀書增進得多，成舍我造就的這批人材，差不多都進他自己辦的報館，所以他這一系與其他新聞學校是不同的。（郭步陶，1937，頁3）

抗戰期間北平淪陷，北平世新停辦。1942年，成舍我在桂林讓北平世新復校（即「桂林世新」），招收50名「印刷職業班」學生，結果入學考試時又來了四百

多人（李鴻銘，1998）。程其恆（1944，頁170）在所著《戰時中國報業》附有「新聞教育機關一覽表」，僅收錄抗戰期間中國最重要的六所學校。除復旦與燕京新聞系，還包括從南京遷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成立於1935年，即後來的政治大學新聞系）、由上海遷重慶的民治新聞學專修學校（1928），以及遷往四川萬縣的上海法學院報業管理專修科，六所學校中桂林世新也名列其中。可惜桂林世新僅維持兩年，就因桂林淪陷再次停辦。再後來要到1945年對日抗戰結束，北平《世界日報》才得以恢復，北平世新也重新招生，抗戰後的北平世新設有「印刷職業班」50人和「編採班」30人，但最終還是因國共內戰國軍失利而在1948年7月告終（賀逸文等人，1982）。

1952年底，成舍我和家人定居臺北，本想在臺復辦《世界日報》，但因當時政府實施戒嚴與「報禁」，未能如願。1953年4月18號成舍我在《新生報》發表專文〈需要一萬名新聞幹部回大陸〉，強調培養新聞人才的重要，許多人勸他既然辦報不成不如開辦學校。當時的臺灣當局既不讓成舍我辦報，又擔心他會「悶出問題來」，於是也鼓勵他辦學校（成嘉玲，1998，頁165）。成舍我本憂心年近六十難看見辦學成果，據說是程滄波以復旦創辦人馬相伯耳順之年辦學的案列相勸，才讓他毅然決定籌辦臺灣世新（成舍我，1976年10月15日）。

成舍我原想辦的是專科或本科，但因當時政府對大專設立管制嚴格，只能先辦職業學校（成嘉玲，1998）。於是他邀集一群文化界聞人，包括于右任、王雲五、端木愷、程滄波、黃少谷、葉明勳共同發起，並四處募款籌資。最後僅靠30萬臺幣和私人貸款，終在1956年，於原本「雜草叢生、闖無人跡」（葉明勳，1998，頁222）的溝子口山麓，順利開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這是臺灣世新的肇始，最初設立「編輯採訪科」，招收初級高級各一班。

1960年，因辦學成績優良，世新獲准升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並設「新聞科」。1962年，新聞科一分為三，成為「編輯採訪」、「報業行政」和「廣

播電視」三科。之後數年，再增設包括「公共關係」（1963）、「圖書資料」（1964）、「電影製作」（1966）、「印刷攝影」（1969）及「觀光宣導」（1976）等五科。1976年時，臺灣世新已發展成涵蓋八門專業頗具規模的傳播學府。

這段期間世新師生仍持續爭取升格。在成為專科的三十多年後，世新終在1991年8月成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最初設立五個專業科系——「新聞」、「公共傳播」（分公關、廣告、觀光三組）、「視聽傳播」（分廣播、電視、電影三組）、「印刷攝影」以及「傳播管理」。1992年增設全亞洲第一個「口語傳播系」，1994年設立傳播碩士班。為了再進一步轉型為綜合大學，隨後幾年世新又陸續增設「社會心理」、「觀光」、「經濟」、「財務金融」、「行政管理」、「法律」等傳播專業以外的科系。

1997年世新如願實現「在10年內讓學校發展成為一所精緻綜合大學」（成嘉玲，1998，頁169）的目標，獲准改制「世新大學」。世新大學下設四個學院。原有的傳播專業納入新聞傳播學院，並新增管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和法學院。1997年，世新獲准設立全臺第二個傳播學博士班，開始頒授傳播博士學位。今日的世新新聞傳播學院共有八個學系，涵蓋「新聞」、「廣播電視電影」、「公共關係暨廣告」、「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資訊傳播」、「數位多媒體設計」與「傳播管理」，無論就專業種類和主修學生總數來看，世新的傳播學發展在臺灣都是最領先的，沒有之一。

肆、探索世新的價值精神

要梳理「世新模式」，除了理解歷史沿革，另一途徑是剖析世新作為傳播教育機構所信奉的價值精神，即組織文化學者所稱之「奉行價值」（*espoused values*）（Schein, 2017）。對此我們可從四方面切入：一、世新最初名稱中和「世界三報」共用的「世界」一詞；二、世新從北平世新時代便崇尚的「手腦並用」原則；三、之後和「手腦並用」並列世新校訓的「德智兼修」；以及四、成舍我以其處事典範與辦校風格傳遞給師生的「我要說話」與言論自由價值。

一、世界——喚起民眾的價值精神

世新辦學模式奉行的首項價值來自世新的原始校名——「世界」新聞學校。這個「世界」無疑是承襲了成舍我創辦的「世界」三報。

成舍我為何選擇以「世界」作為報紙和學校名稱，缺乏可提供解答的直接證

據。但據學者與成舍我後人對其思想脈絡之研究，一種觀點是「世界」來自成舍我長期主張的「世界主義」，而這個「世界主義」是五四運動前後盛行之「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一支。例如成舍我之女成露茜等人便主張三報中的「世界」是成舍我「擁護無政府主義裡分化支脈世界主義理想的映射」（成露茜等人，2011，頁 241）。李金銓（2019，頁 242）也認為，「成舍我創辦報系和新聞學校，均以『世界』為名，可見他對世界主義如何推崇」。張育仁則有以下論斷：

後來，無政府主義這一思想派別分化為許多支，其中的一支就是成舍我奉為人類真理的「世界主義」。他之所以將自己所有的報紙都冠名為「世界」，其思想奧妙就在這裡。（張育仁，2002，頁 418）

成舍我信奉的世界主義，反對暴力革命，主張「以人道和互助實現理想」（李金銓，2019，頁 242）。也因為世界主義下的「大同」思想，成舍我重視報紙對一般民眾的宣傳教化功能，深信「喚起民眾」為實現世界大同之必要。他在五四運動之後尚未辦報之時就深信「我以為文化運動最大的武器就是報館」（成平，1920，頁 4）。因此他一直主張報紙應從事「大眾教育」（citizen pedagogy），廣泛傳遞實用知識，並作為「大眾娛樂中心」（Chow, 2009, p. 58）。

成舍我的世界主義不僅反映於「世界」三報，也與他一生中創辦的其他報紙關係密切。當年中國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李石曾，1927 年元旦為成舍我的《民生報》撰寫新年祝詞，就曾這麼註解——「《民生》與《世界》南北輝映、互為表裡，此實即世界之真義，亦即民生之真義也」（賀逸文等人，1982，頁 72）。成舍我後來創辦的《立報》，也帶有先立大眾再立國立民的理念。難怪有人戲稱，成舍我若要再辦新報，名稱可以是「世界民生立報」（宋小嵐，1945 年 9 月 25 日，頁 26）。

落實到新聞理念上，成舍我的世界主義反對報紙的菁英導向，致力讓報紙更大眾化（Chow, 2009; Eaman, 2009）。這就是他在 1933 年北平世新的開學典禮上所強調的「報紙要向民間去」（成舍我，2012b，頁 90）。他辦報是辦給一般民眾看的，售價要讓一般民眾可以負擔，內容要被一般大眾所能接受。1927 年辦《民生報》時，成舍我也以利於大眾接受的「精、簡、全」為其編輯政策（周靖波，1998）。1935 年的上海《立報》更是在創刊宣言便直接標舉「報紙大眾化」（成舍我，1998）。《立報》廣受歡迎的特色就是透過簡單語言，來呈現簡短的硬性與人情趣味新聞（MacKinnon, 1997）。但成舍我反對黃色新聞式的大眾化，他說：

……我們要報紙大眾化，是要報紙真能走到民間去，如果大眾化的結果，只是造成幾個像美國一樣的黃色報紙大王，他們只知道個人發財，不管社會遭殃，那麼這種大眾化的報紙，試問於大眾有何利益？（成舍我，1935，頁 109）

誠如大陸學者周海波（1998，頁 129）所言，成舍我是要「努力將報紙辦成為大眾所能接受的喚起大眾思想情感的報紙」，而非走嘩眾取寵的路線。大陸學者李時新（2012，頁 4）則認為成舍我是要結合大報重視要聞和小報短小價廉的長處，卻摒除大報生硬價昂和小報低級娛樂的短處，辦成一份介於大報小報間的「第三種報紙」。

因此雖然包括 MacKinnon 和 Eaman 等西方學者，常將成舍我與美國報業大亨赫斯特（William Hearst，1863–1951）作連結，但成舍我本人對赫斯特的黃色新聞風格卻是毫不欣賞。林海音（1998，頁 242）回憶，成舍我曾明白表示赫斯特辦報的誇張渲染是「報下之品」，他更嚮往的報人典範其實是創辦英國《每日郵報》和《每日鏡報》，後來主持《泰晤士報》的北岩爵士（North Cliff，1865–1922）（林海音，1998）。

對成舍我而言，要實現報紙大眾化，必須透過新聞教育讓具有理想性的人才投入，才能避免報紙的「資本化」傾向。談及創辦北平世新的緣由時，成舍我曾經明白地將把辦新聞學校作為辦大眾報紙的基礎：

後來經過縝密的考慮，覺著要實驗我們的理想，非有根本徹底的辦法不可。而人才的準備，尤其必要。最好先辦一所新聞學校，一方面訓練未來的人才，一方面在學校裡可以創辦一個民眾化的報紙。（成舍我，1935，頁 112）

因此我們可以對成舍我的「世界」做以下理解。實現世界大同首須喚起民眾，喚起民眾要靠大眾報紙——這就是唐志宏、連慧珠（2011，頁 159）總結的，成舍我是要先讓報刊「大眾化」，方可進而「化大眾」，而實現報紙大眾化則必須從培養能辦大眾報紙的人才開始。「世界」新聞學校的理想是，人才來自大眾，報紙辦給大眾，而受報紙啟發的大眾，可以實現更美好的世界。

二、手腦並用——落實實踐的價值精神

自創辦以來，臺灣世新就是以「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為校訓（成舍我，1982年6月19日），其中更早出現的是「手腦並用」。當年在北平世新的印刷實習工廠門口有副對聯，上下聯是「莫刮他人脂膏，要滴自身血汗」，橫眉就是「手腦並用」（成舍我，1935，頁114）。

成舍我創辦新聞學校的主要動機，就是要培養手腦並用的人才。在提到「理想的新聞教育」時，他這麼寫道：

……我的原意是想替中國今後的新聞事業訓練一些手腦並用的小朋友。假使這些小朋友，真能完成他們的畢業，那麼，他們將來的技能，是一方面穿上長衫，做經理，當編輯，一方面也可以換上短衣，到印刷工廠中，去排字、鑄版、管機器。（成舍我，1935，頁105）

成舍我期望未來到報館工作的人，能真正做到「沒有勞心勞力的區別」。這樣既可避免勞心者對勞力者的壓榨（這就回應了馬克思），也有另一好處——當報館中人人都能兼顧勞心與勞力時，相互理解將更「容易協調」。他也堅信要真正辦好報紙，對於編輯採訪等勞心工作與排版印刷等勞力工作，「也有融會貫通的必要」，這就闡明了「手腦並用」的真諦。

相較其他新聞教育機構，「手腦並用」儼然成為北平世新的品牌特色，1935年的《報學季刊》在介紹北平世新時這麼敘述：

北平新聞專科學校，係北平《世界日報》及南京《民生報》合力所創辦，其目的，在造就「手腦並用」的新聞技術人才。（申時電訊社，1935a，頁122）

創辦北平世新這樣一所重視動手和新聞技術的學校，成舍我很大程度受到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啟發，他說「美國最完備的新聞學校，當首推密蘇里大學的新聞學院」（成舍我，1935，頁109）。如MacKinnon（1997, p. 12）便認定成舍我創辦北平世新是赴美訪問密蘇里新聞學院後的「直接結果」。

而手腦並用，據曾任世新校長多年的成嘉玲（1998，頁170）解釋，是在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其目標是「本校畢業生離開學校進入傳播機構後，咸能

立刻上線，並能恪守工作崗位」。這就是世新師生和校友朗朗上口的，在進入職場時，世新畢業生將不會成為「二度新鮮人」（李正宗，1998，頁 113）。

如前所述，中國早年新聞教育，受密蘇里模式影響較大。北平世新之前，聖約翰大學報學系的首任系主任就是身為密蘇里新聞學院校友及教授的柏德遜（Don Patterson），燕京大學更與密蘇里新聞學院直接合作。而 1935 年創辦的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首任系主任也是畢業自密蘇里新聞學院的馬星野（許曉明，2016；羅文輝，1989）。不過世新與其他機構的最大不同，是世新的實務是上至管理採訪下至印刷工廠的實務，不以勞心勞力為界限。且世新的人才養成與報館緊密結合，力求學生時刻在學、即時可用，在學習中和畢業後都能走進報館、走進人群。舉例來說，成舍我（1935，頁 107）曾提到，即使是不入高級班的初級班畢業生，在報館「留用」後也會「每天以一半時間叫他們用手（印刷），再以一半時間叫他們用腦（採訪或報業管理）」。相較起來，其他大學的教育模式更容易被批評為是「象牙塔」教學，如復旦畢業生杜紹文（1939，頁 3）便曾寫道：不讓學生去「十字街頭」來「開一開眼界」的新聞教育，可說是「不合現實不能實踐的教育」，學生「總有一天會大失所望」。在總結中國新聞教育「失敗」或「未能如理想的成功」時，陳錫余（1948，頁 6-7）歸納的原因除了「不重視新聞教育」、「報業環境不好」與「教師教材缺乏」外，另一項關鍵就是「設備簡陋，不能使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這使得「實習太少」成為中國新聞教育的主要問題。「到了學生離開學校進入報館，未能勝任實際工作」，這就導致外界認定「新聞學校與新聞事業無關」，甚至「新聞教育無用」。這些都說明了理論實踐整合確實是知易行難。這讓成舍我「以實務課程為主，理論課程為輔」的辦學模式（唐志宏、連慧珠，2011，頁 170），相較其他新聞學校確實與眾不同。

成舍我對實務的重視，還可以從課程設計上實習課程的所占比重看出來。表 1 是以 1940 年代施志剛（1948）對六所新聞學校的課程統計為基礎，將之與北平世新初級職業班的課程規劃作比較，可以看出北平世新對實習課程的側重十分明顯。

成舍我辦學重視實習的作法也和多年後王公亮（1948，頁 8）與若干大學新聞系師生談論起新聞教育的共識非常類似，他說：

我們咸認為新聞系倘能減少教授新聞學理論的鐘點，而增多進修其他科目的時間，再利用假日光陰派遣學生赴各新聞事業機關實習，既可使理論與實際配合，更可使學生增多充實基本學識之機會。

表 1：北平世新與其他新聞教育機構課程比較表⁹

| 學校 | 類別 | | | | | 共計 |
|--------------|--------------|--------------|--------------|--------------|--------------|-------------|
| | 本系科課程 | | 文法科共同課程 | | | |
| | 理論課程 | 實習課程 | 語文課程 | 史地課程 | 其他課程 | |
| 政治大學 新聞系 | 33 27.73% | — | 43 36.14% | 11 9.24% | 32 26.89% | 119 100% |
| 復旦大學 新聞系 | 36 45.00% | 2 2.50% | 24 30.00% | 9 11.25% | 9 11.25% | 80 100% |
| 民國大學 新聞系 | 73 52.53% | — | 27 19.37% | 17 12.25% | 22 15.85% | 139 100% |
| 暨南大學 新聞系 | 7 16.28% | — | 9 20.93% | 6 13.95% | 21 48.84% | 43 100% |
| 中國新聞 專科學校 | 44 31.43% | 8 5.72% | 41 29.28% | 20 14.29% | 27 19.29% | 140 100% |
| 民治新聞 專科學校 | 18 50.00% | 3 8.33% | 6 16.67% | 2 5.56% | 7 19.44% | 36 100% |
| 北平新聞 專科學校 | 2 5.13% | 20 51.28% | 10 25.64% | 2 4.10% | 4 5.13% | 39 100% |

資料來源：北平新聞專科學校以外之統計引自施志剛（1948，頁 6），北平新聞專科學校課程統計則取自申時電訊社（1935a，頁 124）。

成舍我對「手腦並用」的重視曾被批評是搞「學徒教育」（宋小嵐，1945 年 9 月 25 日），但這其實是只見其「手」而未見其「腦」。唐志宏、連慧珠（2011，頁 177）也提及成舍我的辦學是結合學院型和學徒型「兩條不同取徑」，並認為成舍我學院型辦學是從「報童工讀學校」為基礎再走向北平世新，但兩人明確指出成舍我的北平世新原來的構想上是要走向他早年即非常嚮往的「大學校」，可惜因戰亂最後只開辦了初級和高級職業班，而非完成本科的設立。大陸學者黃志輝（2017，頁 274）則認為，成舍我辦學的方針是「適時地根據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在新聞事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提出不同的培養方案」，透過對成舍我的深入研究，他認為「培養視野寬闊的高級新聞人才」才是成舍我真正追求的目標。當然成舍我眼中，高級新聞人才也必須懂得報館中必須動手做的各項事務。

成舍我的手腦並用還有一個目的，1932 年 4 月他應邀到燕京大學新聞系演講〈中國報紙之將來〉時曾談及報館組織，曾經提到「未來的中國報紙，他應該受民眾和讀者的控制，他的主權，應該為全體工作人員——無論知識勞動或筋肉勞動者所共有」，如此才能「絕對獨立，不受『商業化』任何絲毫的影響」（成

⁹ 唐志宏、連慧珠（2011，頁 175）亦曾將施志剛之統計與北平世新相較，但在北平世新的課程比例計算上根據的是與本文不同之來源。

舍我，2012a，頁 34）。由此可見成舍我理想的報紙經營是一種「由下而上」，讓報館為全體成員所有的模式，如此才更能呼應民眾和讀者的需要。則就是成舍我在北平世新開學典禮上所說的「工作者有其報」（成舍我，2012b，頁 90）。但要報館主權屬於全體，如果基層人員不能有手有「腦」，「行使這種主權，當然非常困難，就是貿然接受，等到行使起來，其結果也要有名無實」（成舍我，1935，頁 107-108）。由此可知，成舍我辦報乃至於辦學強調的「手腦並用」，也與他世界大同喚起大眾的世界主義關係密切。

三、德智兼修——堅守道德的價值精神

雖然自創辦時起，「德智兼修」就是臺灣世新校訓的一部分。但論者提及北平世新和桂林世新，則較偏重「手腦並用」，特別是其中「手」的部分。不過成舍我對用腦以及對品德和智識的重視，卻早在北平世新时期即明白展現，並一直延續到臺灣世新。成舍我（1996a，頁 557）曾經引用密蘇里創院院長在北大演講的內容，強調從事新聞工作「學識」、「技術」和「人格」都很重要，「而人格尤其重要」，技術是「手」，學識和人格是「腦」，其中學識是「智」，人格是「德」。

在「德」方面，1935 年成舍我在為《報學季刊》所寫的〈我所理想的新聞教育〉文中，就曾言及北平世新重視對學生「忠於職守」的訓練，而「忠於職守」的一項關鍵就是在新聞工作上不能造假。為了說明此點，成舍我還舉出某記者「消息任意捏造，騙自己，騙報館」，終至穿幫的案例。成舍我也強調他教育學生「與其信用耳朵，不如信用眼睛」（成舍我，1935，頁 106-107），這是要學生重視親身查證而不應道聽途說，怠忽記者職守。

在臺灣世新，成舍我以培養「品德第一的最優秀新聞人才」為念，他經常用下面這段話勉勵世新每年的畢業生：

你們畢業以後如果進入報館，你們手中的一支筆，正和戰士肩上的
一管槍相同。如果新聞記者的筆，不用來維護正義，獎善懲惡，相反的
卻要求賄賂、受人奉養、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則這一類的記者，其罪
惡與戰士不用槍保衛國家、殲滅敵人，而只是威嚇善良、搶劫強暴，或
報仇洩憤，同該受全國唾棄、最高刑罰。（成舍我，1982 年 6 月 19 日，
第 4 版）

其實在成舍我創辦世界三報前，還曾短暫辦了《真報》。《真報》雖不成功（吳範寰，1963），但可知追求正義與真理是成舍我多年秉持的價值精神。

成舍我的教育理念也很重視「智」。追求廣泛新知無論對新聞學校學生或新聞工作者，都很重要。成舍我本人很早便展現求知不懈的精神，北大時期他勤於翻譯外文著述，在創辦《真報》和世界三報前，便曾先後組織了「新知編譯社」和「新知書社」（吳範寰，1963；〈新知書社開會紀事〉，1921年3月8日）。他的翻譯和文字在五四前後中國的覺醒年代裡，留下了鮮明印記（游梓翔，2019；Chow, 2009）。

成舍我辦學，同樣著眼於提升新聞專業的「智」。他強調，「高深的研究和普通技術的訓練」兩者均不可偏廢（成舍我等人，1947）。他也深信必須積極提倡新聞教育的學理研究：

其實新聞教育一方面固然是職業教育的一種，一方面何嘗不含有高深學理的研究，尤其號稱民本主義的國家，新聞教育，更有積極提倡的必要。（成舍我，1935，頁 110）

他還以醫科和法科為例，駁斥論者僅因新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育新聞記者，就貶其為欠缺學術價值的說法。醫法兩科同以培養醫師律師為務，卻無礙兩者成為大學重要學科。成舍我強調，「新聞教育一方面是職業教育，一方面也是文化教育的一種，技術的訓練和學理的研究都應該同樣重視」（成舍我，1935，頁 110）。

成舍我很重視新聞學理，當年北平世新的「新聞學」課程，是由他親授。林海音（1998，頁 239）回憶說，「那時有一本徐寶璜翻譯的《新聞學》，以及邵飄萍等人寫的有關新聞學方面的幾本書，舍我師都瞧不上，所以他寧可親自講授他自己的一套」。斷言北平世新只著重養成新聞實務技術上的「手腦並用」人才，明顯忽略了成舍我對「德智兼修」同樣看重的事實。

四、我要說話——言論自由的價值精神

作為編輯和報人，或是作為立法委員和教育家，成舍我一生始終力行「敢言直言」，重視言論自由的價值精神。早年最為人稱頌的事例，就是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不久，成舍我在 5 月 23 號的《益世報》上所寫的署名社論《安福與強

盜》，痛批北洋軍閥的腐敗。1924年開辦《世界晚報》，四項宗旨中的前兩項就是「言論公正」和「不畏強暴」。¹⁰後來上海《立報》在發刊詞中申明「憑良心說話」是《立報》編輯的首要原則（成舍我，1998）。在專業生涯中，「不畏強暴」曾多次讓成舍我身陷囹圄甚至危及生命（周靖波，1998），但他對言論自由的堅持始終如一。

在創辦北平世新的1930年代，成舍我同時積極參與當時爭取言論自由和反民權壓迫的重要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Wasserstrom & Perry, 1994）。北平世新正式招生前夕，在1933年1月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上，成舍我還當選了該分會的執行委員，和他同時列名該會執委的社會賢達還包括胡適、許德珩、蔣夢麟等人（耿雲志，1998，頁1996）。也就是此種重視言論自由的立場，讓張育仁（2002，頁326）認定成舍我創辦北平世新的目的之一，即是要「培養為我所用的自由主義新聞人才」。

1955年，臺灣世新創辦的前一年，成舍我曾以立委身分，在立法院十五會期五次會議上，質詢當時的行政院長俞鴻鈞。質詢發言稿後來以〈「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為題，在《自由中國》雜誌發表。這篇鏗鏘有力的文字強調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兩大支柱」，並舉出多起當時政府有侵害人權疑慮的案例，包括報禁、查禁報刊等問題，發出正義之聲（成舍我，1955，頁8）。

成舍我重視人權保障和言論自由的立場，臺灣世新的辦學上更加彰顯。臺灣世新的教師聘用可謂海納百川，吸納了許多「政治上有問題的知識分子」（王曉波，1998，頁107），因「臺大哲學系」政治事件遭臺大解聘，平反回臺大任教前被世新聘為教授的王曉波這麼回憶：

在那個時候，雖然每年暑假都傳說上面又有解聘的「黑名單」下來。但是我們都很安心，在舍老的保護傘下，我們這些被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仍能安心的教學研究。「世新」竟成為在戒嚴時期，臺灣唯一的「自由學府」。（王曉波，1998，頁107）

正因成舍我和臺灣世新在言論立場上的包容，讓《天下雜誌》在一篇報導中說「前半生辦報，後半生辦學、問政，成舍我始終堅持為異議分子留一個空間」（鄭一青，1998年1月1日，頁299）。

10 《世界晚報》的四項宗旨是：言論公正、不畏強暴、不受津貼與消息靈通。

成舍我逝世前一年，因病住院，病情影響了口語表達，但他仍經常掙扎手書「我要說話」四字。後來「我要說話」就被人們用來總括他追求言論自由的一生，認為這足以作為成舍我「獻身新聞事業八十年的最佳表白」（鄭一青，1998年1月1日，頁298）。

這個「言論自由」或「我要說話」的價值精神，要說的話主要是什麼話呢？成舍我或許在當年創辦《世界晚報》時就給了答案，據說他辦報「最大的願望」，就是「第一是要說自己想說的話；第二是要說社會大眾想說的話」（黃侯興，1998，頁72）。

伍、「世新模式」對傳播教育挑戰之因應

就在本文上述兩節梳理的發展歷程積累和價值精神堅持中，世新發展出了新聞傳播教育辦學上獨特的一套「世新模式」。雖然成舍我在1991年——世新升格為學院的前夕離開人世，但他所創造的「世新模式」讓後來三十年接下辦學火炬的後人，面對前述傳播教育的挑戰，得以發展出不同凡響的應對策略。

首先，面對「理論／實務斷裂」，「世新模式」的應對策略是在重視新聞傳播學理價值的同時，始終強調「手腦並用」——重視傳播實務的訓練，避免成舍我所謂「勞力」和「勞心」的二分。正因為強調「手腦並用」，世新的新聞傳播教育一直更接近成舍我嚮往的美國「密蘇里模式」——與實務界緊密對接，培養能上手的人才，這讓世新畢業校友深受業界歡迎。《Cheers雜誌》所說「綿密的校友網絡與貼近實務脈動，始終是世新的一大優勢」，可說就是來自世新並重理論實務的「手腦並用」。

而且，從專科時代的八科到現在新聞傳播學院的八系，世新重視的實務是非常多元，涵蓋新聞傳播繽紛面貌的實務。成舍我曾對世新的專科畢業生說了以下這段話：

我們的校名，是「新聞」，但實際上我們的範圍，已包括了整個大眾傳播。我們畢業的同學所用工具，將不僅是一支筆；所服務的機構，將不僅是報館，舉凡廣播、電視、電影、戲劇、圖書、印刷以及觀光旅遊，它們能否發揮最大功效，都無一不與我們的民主政治，血肉相連。（成舍我，1982年6月19日，第4版）

簡言之，世新名為「新聞」，卻早已延伸至「媒體」和「傳播」。多元的專業設置有利於世新學生在校內「跨界」。當年的世新可說就已在傳統媒體時代實現了「全媒體」。¹¹而隨著數位資訊網路行動等新媒體的到臨，匯流已成趨勢，今日世新正式採納為辦學方針的「全媒體」策略，則是在強調跨媒體內容的融合（游梓翔，2018）。正是此種在同一學院涵蓋豐富多元專業，並鼓勵學生跨系修課的設計，讓學生更容易培養出跨媒體的知能，有利於實現創作上的「融合」。這個實務上因應新興媒體而來的「全媒體」策略，是今日「世新模式」的一大特色，但卻與成舍我早年多元媒體實務的辦學理念密切相關。

特別是今日的大學教育，面對的是遠比過去更強烈的「應用型教學」和「導入新科技」的期待（Moscardini et al., 2020），都可能讓世新「手腦並用」、「理論與實務並重」和「全媒體」的特色更具時代競爭力。

其次是「口語／媒體斷裂」的挑戰。雖然臺灣乃至整個華人傳播教育界，在1990年代前基本呈現獨重新聞與大眾傳播的趨向（Kim et al., 2008），但世新在1992年就創建了迄今仍是臺灣唯一的「口語傳播系」，這讓口語傳播一脈的專業課程——如演說辯論、人際傳播、組織傳播、跨文化傳播等，得以既廣且深地融入了世新的傳播教育中。像是世新設置的傳播博士班，其博士人才的培養方案就高度整合了口語傳播及媒體傳播的理論與研究。口語傳播專業在理念上繼承了來自西方的古希臘羅馬民主修辭傳統，堅信言論自由，重視語言表達與理性論辯。雖然成舍我未能親見口語傳播系的成立，但口語傳播的教學研究理念，可說與成舍我「我要說話」的價值精神非常契合。

其實納入口語傳播專業消弭「口語／媒體斷裂」的想法原非僅見於世新。臺灣同以新聞傳播教育見長的國立政治大學，1990年代擬定的中長程計畫中原也有增設「語藝」學系——即口語傳播系的提議（中華民國新聞年鑒編輯委員會，1991，頁321），可惜後來並未實現。這使得納入口語傳播課程，凸顯「人與媒體並重」，成為傳播教育的「世新模式」的獨有特色。兼容口語與大眾傳播、人際與媒體傳播的世新，不僅是「全媒體」教育，也是「全傳播」教育。

而在社群媒體盛行後，人與媒體的整合似乎比過往更受重視。甚至有西方學者認為這是個「媒體傳播＋人際傳播」的「人媒傳播」（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時代（O'Sullivan & Carr, 2018）。為了因應此種趨勢，世新的口語

11 世新大學的「全媒體大樓」於2019年啟用，其「全媒體」主要在表達媒體匯流融合之特性，故以“omnimedia”為正式英文名稱。但此處之全媒體除匯流融合也希望涵蓋世新自成舍我時代以多元媒體樣態為特色的辦學理念，因此“all media”似乎更能表述此一脈相承之特色。

傳播系獲准在 2020 年更名為「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將「人媒傳播」納入學系的核心關注中。未來更多的「人媒整合」也讓「全傳播」的「世新模式」更具競爭優勢，這等於是成舍我新聞實務與我要說話理念的深度交融。

另外，面對「歸人／過客斷裂」的挑戰上。今日在世新大學作為始終以傳播教育為特色的綜合大學，即使是傳播以外的專業，如管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與法學院旗下的不同領域，也與傳播專業互動密切，成為傳播教育的多方支援和堅強後盾。培養多元知識基礎其實也是成舍我新聞教育「德智兼修」的重要部分。當年北平世新創辦時設立的「初級職業班」所開七門課程中，與新聞直接相關的僅有三門（新聞學、新聞學實習、印刷實習），其餘四門是國文、英文、社會科學大意與自然科學大意；同時設立的「報業管理夜班」所開五門課中，也只有報業管理直接與新聞相關，其餘則是簿記、會計、統計、商業通論等管理知能課程（申時電訊社，1935a）。成舍我辦學的這項特色，落實了黃桷多年後在談到改進中國新聞教育說的這段話：

……新聞學雖然已經被公認為一種獨立的科學，但是它和其他科學都永遠有著最密切的關係。說得露骨一點：新聞學實在就是由於別各種科學輔助而成的。因此，一個學習者應當在本科幾門課程外，更要努力於政治、經濟、史地一級別的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學習。（黃桷，1945，頁 7）

延續至今，世新雖然已發展綜合大學，但不同專業領域支援發展傳播核心的辦學特色仍在。例如財務金融系結合金融與傳播的財經新聞特色，法學院結合法律與傳播的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或是像世新的英語系最近更名為「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等。在世新，傳播學不是個只有過客而缺歸人的十字路口，更像是多元學科共享傳播興趣的「交會中心」（hub）。

因此在世新的辦學設計下，如同在 Schramm 的時代，傳播學以其獨特視角，為其他專業做出貢獻，而其他專業也能為傳播學灌溉養分，但不同的是多元專業背景的師生並非短暫停留，其中很多會選擇在這個交會中心生根立足，透過傳播連結來凸顯與其他學校相同專業相較時的專長與特色。這就是世新推動多年，被稱為「傳播貫穿各學門」的辦學策略，也就是游梓翔（2018）所說的「全貫穿」。「全貫穿」在世新拉近了經常挑戰傳播學界的「歸人／過客斷裂」，給予「世新

模式」更大的競爭力，而這一切始於成舍我新聞辦學下豐富新聞人才知識視野的「德智兼修」。

陸、總結：延續翠谷傳奇

1933年北平世新開學時，成舍我曾對學生勾勒以下的願景：

只有同學和各位教職員，都來共同努力，將來新聞專科學校一定可以做成一個完全的學校，一天天的發展起來，或者能造一個十層樓八層樓的工廠化的學校也未可知。（成舍我，1935，頁114）

臺灣世新當初創辦時，資源缺乏，成舍我連自宅都拿去抵押籌款。透過戮力辦學、節儉持校，一路走來才有了今日世新大學的規模。今天的世新僅是一棟「全媒體中心」大樓，就是「十層樓八層樓的工廠化」的規模。而這個新的工廠已不是作為傳統印刷媒體骨幹的排字印刷工廠，而是在數位社群時代容納眾多新傳播科技的數位內容製作工作坊。不過無論傳播科技如何進展，終究只是「用」，一所學校最重要的是她的「體」，她的文化、她的歷史、她的價值精神。

從北平世新到桂林世新，從臺灣的世界新聞職業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到現在的世新大學。世新多年來以其秉持的喚起大眾理想，對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的重視，和對我要說話的堅持，創造出了獨特的「世新模式」。

這些由成舍我多年來鍛鑄的價值精神，作為世新辦學的理想典型，在發展過程當然難免遭遇現實的挑戰。在世界主義思維下，成舍我無論報紙和學校都是為大眾而辦，反對「商業化」。但私人辦學不靠政府資助，僅靠學雜費和捐助，堅持「手腦並用」需要鉅額的實習設備投資，堅持「德智兼修」則必須禮聘一批優秀的教師隊伍，為求資源有效運用常須有所取捨，這也難免引發不同議論。但成舍我（1976年10月15日，1996b，頁328）從創辦臺灣世新時起即堅信辦學是「捐資」而非「投資」，更認為以營利為目的之「學店」是「下流所歸，君子不齒」，世新始終奉行不悖。而在臺灣多元政治環境下，批評討論校務實屬常態，¹²但持不同觀點師生論辯時仍多以「我要說話」的言論自由價值律己律人（如

¹² 例如世新學生的獨立媒體新聞人報社旗下的「新聞人電子報」，便經常對世新校務提出批評，參見 <http://www.newspeople.com.tw/author/>

吳柏軒，2014 年 12 月 24 日）。由此可知，實踐上偶有不同意見與爭辯，但成舍我的精神價值無疑在今日的世新校園延續著。

從新聞教育角度來看，「世新模式」的另一項特色，是以獨特策略回應了「理論／實務」、「口語／媒體」，以及傳播學和其他領域「歸人／過客」的斷裂分歧。但世新多年的堅持包括：一、在理論研究中總堅持實務應用才是傳播教育的基石；二、在關注媒體時總不忘關懷閱聽使用媒體之人羣，對人的溝通、言論自由乃至社群傳播給予重視；以及三、在辦學規模提升後，始終堅持傳播學的發展軸心，營造出傳播貫通多元專業的學術生態。這些都是「世新模式」的特色。

世新在臺灣走過了 65 個年頭，若從「世界三報」和北平世新算起，則已接近一個世紀。可以預見的是，傳播科技仍將持續變化，新聞教育在培養人才上的挑戰也將不斷增加。但懷抱世界、手腦並用、德智兼修、我要說話的「世新模式」，仍會在下一個百年作為華人新聞傳播教育的重要成員。

參考書目

- Williams, W. 著，林斯陶譯（1921）。〈世界新聞學〉，《稅務專門學校季報》，3（1）：40-41。
- 卜少夫（1944）。〈談新聞教育〉，《新中華》，2（4）：69-78。
- 王公亮（1948）。〈興革大學新聞教育管見〉，《知識與生活》，31：8-9。
- 王師萊（1947）。〈新聞教育的重點在哪裡？〉，《文化通訊》，2：2-3。
- 王曉波（1998）。〈臺灣知識分子的自由堡壘——記成舍我先生與「世新」〉，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99-109。北京：新華。
- 中華民國新聞年鑒編輯委員會編（1991）。《中華民國新聞年鑑》（八十年版）。臺北：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 方漢奇編（2000）。《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上》。福州：福建人民。
- 申時電訊社編（1935a）。〈新聞教育機關概況：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報學季刊》，1（2）：122-124。
- _____（1935b）。〈新聞教育機關概況：滬江大學商學院新聞學科〉，《報學季刊》，1（2）：115-116。
- 成平（1920）。〈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新人》，1（5）：6-12。

- _____ (1935)。〈我所理想的新聞教育〉，《報學季刊》，1（3）：105-115。
- _____ (1955)。〈「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自由中國》，12（6）：8-11。
- _____ (1976年10月15日)。〈我如何創辦世新〉，《聯合報》，第12版。
- _____ (1982年6月19日)。〈董事長勉應屆畢業生〉，《小世界》，第4版。
- _____ (1996a)。〈傳播教育會訊：報禁開放與新聞教育〉，唐志宏（編），《成舍我先生文集：港臺篇，1951-1991》，頁555-558。臺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暨新聞史研究中心。
- _____ (1996b)。〈「捐資」與「投資」〉，唐志宏（編），《成舍我先生文集：港臺篇，1951-1991》，頁327-328。臺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暨新聞史研究中心。
- _____ (1998)。〈我們的宣言〉，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60-64。北京：新華。
- 成舍我 (2012a)。〈中國報紙之將來〉，劉家林、王明亮、陳龍、李時新（編），《成舍我新聞學術論集（上冊）》，頁28-48。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_____ (2012b)。〈如何使報紙向民間去〉，劉家林、王明亮、陳龍、李時新（編），《成舍我新聞學術論集（上冊）》，頁85-90。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成舍我等人 (1947)。〈當前報業的幾個實際問題〉，《新聞學季刊》，3（2）：1-6。
- 成嘉玲 (1998)。〈「世新」永遠的老校長：父親在新聞教育上的理念與貢獻〉，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164-173。北京：新華。
- 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 (2011)。〈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和實踐：成舍我的「非資本主義大眾化報刊」〉，《新聞學研究》，106：219-248。[https://doi.org/10.30386/MCR.201101_\(106\).0006](https://doi.org/10.30386/MCR.201101_(106).0006)
- 任白濤 (1941)。《綜合新聞學》。上海：商務。
- 宋小嵐 (1945年9月25日)。〈世界民生立報成舍我：一個新聞怪傑、一個不倒的報人〉，《新聞天地》，1：26-28。
- 李正宗 (1998)。〈「世新」——傳播專業人才的搖籃：並記校友心目中永遠的老校長〉，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110-120。北京：新華。

- 李金銓(2019)。《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臺北：聯經。
- 李時新(2012)。《上海〈立報〉史研究(1935-193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李鴻銘(1998)。〈百歲冥壽念校長——追憶創業艱難，緬懷豐功偉績〉，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252-269。北京：新華。
- 吳柏軒(2014年12月24日)。〈抗議校方撤學生會櫥窗 世新學生怒吼「我要說話！」〉，《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1年2月26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188876>
- 吳範寰(1963)。〈成舍我與《北京世界日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三輯》，頁231-261。北京：中華書局。
- 杜紹文(1939)。〈建設中國本位的新聞教育〉，《戰時記者》，5：2-3。
- 周海波(1998)。〈論成舍我與中國報紙的大眾化趨向〉，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121-135。北京：新華。
- 周靖波(1998)。〈成舍我的業績〉，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5-21。北京：新華。
- 林海音(1998)。〈一生的老師——悼吾師成舍我先生〉，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237-244。北京：新華。
- 施志剛(1948)。〈論中國新聞教育〉，《讀書通訊》，152：2-6。
- 〈記成舍我之新聞專科學校〉(1933年3月4日)。《北洋畫報》，19(902)：1。
- 唐志宏、連慧珠(2011)。〈成舍我的新聞教育實踐：從職訓報童到本科專業(1919-1937)〉，《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5：145-183。[https://doi.org/10.30383/TJH.201105_\(35\).0004](https://doi.org/10.30383/TJH.201105_(35).0004)
- 夏春祥(2002)。〈眾聲喧嘩的迷思：關於傳播研究的筆記〉，《中華傳播學刊》，1：3-26。
- 高海波(2013)。〈論戈公振的傳播思想〉，《國際新聞界》，35(4)：159-167。
- 耿雲志編(1998)。《胡適論爭集：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校聞：名人演講〉(1921)。《清華週刊》，231：12。
- 張育仁(2002)。《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昆明：雲南人民。

- 張詠、李金銓（2019）。〈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踐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頁 343-376。臺北：聯經。
- 郭步陶（1937）。〈中國的新聞教育〉，《學校新聞》，61：3。
- 陳建雲（2010）。《向左走 向右走：1949年前後民間報人的出路抉擇》。福州：福建教育。
- 陳錫余（1948）。〈中國新聞教育與新聞事業〉，《文風學報》，2/3：4-7。
- 許曉明（2016）。《中國近代新聞教育發展史研究（1912-1949）》。石家莊：河北人民。
- 黃志輝（2017）。《追夢與幻滅：報人成舍我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黃侯興（1998）。〈成舍我的三個「世界」〉，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71-88。北京：新華。
- 黃桷（1945）。〈談談目前的新聞教育〉，《新聞戰線》，5（2-3）：6-8。
- 程其恆（1944）。《戰時中國報業》。桂林：銘真。
- 游梓翔（2018）。〈傳播學對新媒體時代的因應〉，《青年記者》，1：67-68。
- _____（2019）。〈我要說話：五四運動與中國的口語傳播時代〉，《傳播研究與實踐》，9（2）：41-75。[https://doi.org/10.6123/JCRP.201907_9\(2\).0003](https://doi.org/10.6123/JCRP.201907_9(2).0003)
- 游梓翔、夏春祥（2003）。〈傳播學門的再思考：口傳與大傳的分立史與整合路〉，《中華傳播學刊》，4：109-144。
- 賀逸文、夏方雅、左笑鴻（1982）。〈北平《世界日報》史稿〉，張友鸞（編），《世界日報興衰史》，頁 40-207。重慶：重慶出版社。
- 〈報童工讀學校募捐啟〉（1926年10月4日）。《世界日報（北平）》，第3版。
- 〈新知書社開會紀事〉（1921年3月8日）。《北京大學日刊》，825期，第4版。
- 葉明勳（1998）。〈懷世新傳播學院創辦人成舍我〉，中國人民大學港澳臺新聞研究所（編），《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221-225。北京：新華。
- 管翼賢主編（1943）。《新聞學集成：第七冊》。北京：中華新聞學院。
- 鄭一青（1998年1月1日）。〈獨立辦報 捨我其誰——成舍我〉，《天下雜誌》，200：298-299。
- 潘乃欣（2018年8月29日）。〈臺大二度奪冠，4成企業說：「有讀有加分」〉，《Cheers 雜誌》，216：64-71。
- 劉海龍（2015）。《重訪灰色地帶：傳播研究史的書寫與記憶》。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

- _____ (2019)。〈中國傳播學 70 年：知識、技術與學術網絡〉，《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8 (5)：106-114。
- 儲玉坤 (1948)。〈論我國新聞教育〉，《報學雜誌》，1 (2)：18-19。
- 羅文輝 (1989)。〈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對中華民國新聞教育及新聞事業的影響〉，《新聞學研究》，41：201-210。
- Altschull, J. H. (1995). *Agents of power: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New York, NY: Longman.
- Chow, E. C. (2009). Serial sightings: News, novelties, and 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old capital. In C. Rojas & E. C. Chow (Eds.), *Rethinking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Cannibalizations of the canon* (pp. 54-74). London, UK: Routledge.
- Dickson, T. (2000). *Mass media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Eaman, R. A. (2009).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journalism*. Lanham, MD: Scarecrow.
- Kim, M.-S., Chen, G.-M., & Miyahara, A. (2008). Communication as an academic field: East Asia. In W. Donsbach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pp. 602-609). Malden, MA: Blackwell. <https://doi.org/10.1002/9781405186407.wbiecc059>
- Lovell, R. (1987). Triumph of the chi-squares. It's a hollow victory. *The Quill*, 75(9), 22-23.
- MacKinnon, S. R. (1997).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Modern China*, 23, 3-32.
- Moscardini, A. O., Strachan, R., & Vlasova, T. (2020).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modern society.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https://doi.org/10.1080/03075079.2020.1807493>
- O'Sullivan, P. B., & Carr, C. T. (2018). 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 A model bridging the mass-interperson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 20, 1161-1180.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6686104>
- Pooley, J. D. (2016). The four cultures: Medi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Social Media + Society*.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16632777>
- Reardon, K. K., & Rogers, E. M. (1988). Interpersonal versus mass media communication: A false dichotom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 284-

303. <https://doi.org/10.1111/j.1468-2958.1988.tb00185.x>

- Rogers, E. M. (1997).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4).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from “Daddy” Bleyer to Wilbur Schramm: A palimpsest. *Journalism Monographs*, 148.
- Schein, E. H. (2017).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5th ed.). Hoboken, NJ: Wiley.
- Schramm, W. (1963).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 Schramm (Ed.), *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directions and new finding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16).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The J-School. (n.d.).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May 22, 2021, from <https://journalism.missouri.edu/the-j-school/>
- Wasserstrom, J. N., & Perry, E. J. (Eds.). (1994).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he Green Valley: Exploring the Shih Hsin Model

Yu, Tzu-hsi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Shih Hsin University

Wen, Wei-Ch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Shih Hsin University, founded in Taipei City by renowned newspaper publisher and educator Cheng Shewo in 1956,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leading brand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school is famous for its dedication to 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ts strong alumni network. As such, Shih Hsin is a valuable case and one of the best practice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analyze Shih Hsin's formula for success as the following: 1. its century-long history of education since the Beijing News College period in the 1930s; 2. its espoused values influenced by Cheng Shewo and his mission as a newspaper publisher, including "cosmopolitanism,"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intelligence,"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 want to speak"; and 3. its strategies ("all media," "all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or all")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 divide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namely the theory-practice divide, the speech-media divide, and the tarrying-passing divide. The study aimed to summarize the features of "Shih Hsin model" in Taiwan'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Keywords: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 Email: tyu@mail.shu.edu.tw

Received: 2021.3.2

Accepted: 2021.5.21

